



珍妮特·温特森

珍妮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这个名字在中国可能还很“小众”，但对于喜爱她的读者来说，她的每一部作品甚至人生经历都是如此丰富、如此独特。这位被英国《独立报》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好也是最有争议性的作家之一”的女作家，在8月来到中国，和中国读者分享了她特立独行的生活和创作态度。

### “对自己坦诚相待”

在外人看来，温特森的人生就像一部文艺电影。她1959年生于英国曼彻斯特，从小被收养，生活在兰开夏。养父母是虔诚的宗教信徒，这对温特森影响很大，养母希望她能够研读《圣经》，将来传教布道。而温特森在物质贫乏的家乡却发现了一座宝库——镇上的图书馆，于是，从排在字母表前面的简·奥斯汀开始，阅读和文学逐渐改变了温特森的生活。

改变温特森生活的还有青春期的爱情。19岁时，温特森爱上了一个女孩。她告诉母亲，这令她欢乐，母亲反问道：“正常就好，为什么要欢乐？”如今，她正在写作的书就以母亲的这句话命名：《正常就好，为什么要欢乐》(Why Be Happy When You Could Be Normal)。温特森与同性的恋情为家庭环境所不容，她离家出走，曾先后在殡仪馆、精神病院等地生活和打工，最困难时住过汽车后备箱。关于这段经历，温特森认为“相比身体上的痛苦，更难忍受的是精神上的痛苦”，她坦然地说：“生活中确实有改变人生的事情，但没有人能够事先预见，也无法事先规划。我们要做的就是与自己和解，对自己坦诚相待。”

1985年，温特森出版《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Oranges Are Not the Only Fruit)，获英国惠特

## 珍妮特·温特森：

# “我创作的是真实的生活”

□本报记者 王 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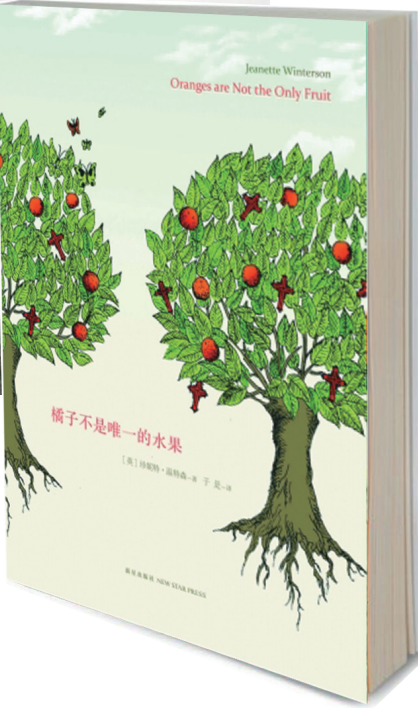
### “写作无规则可循”

读温特森的小说，会发现她的每一部作品在语言、叙事等方面都有创新，令人惊喜连连。在《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中，温特森以《摩西五经》来命名每章的标题，每章末尾的童话，寓言则融入叙述主线，贯穿起“我”的成长以及对人生思考的逐渐成熟。在《出埃及》一章的末尾，温特森讲述了“四面体国王”的故事。一天一个女子带给国王一个由侏儒操控的舞台，侏儒同时表演悲剧和喜剧，所幸四面体国王有多张脸，他可以绕着戏院踱步，同时观赏悲剧和喜剧。温特森写道：“他走了一圈又一圈，终于明白了无价真理：悲喜交替，没有终点。”这也是她在若干年后回顾年少时光得出的感受。在《写在身体上》中，温特森描摹了纯洁而炙热的激情状态，探讨关于爱情婚姻和欲望的痛与乐。

《激情》则以拿破仑战争作为宏大的历史背景，讲述有关战争、有关战争中的个人行为、有关幸存、破碎的心、残酷与疯狂的故事……在温特森看来，写作、艺术是唤醒想象力，释放自由的活动，小说不应千人一面，写作也不应遵守某种规则。

温特森在作品中对语言的重视程度甚至对小说故事性的重视，甚至有点迷恋。毫不夸张地说，是语言掌控着她的故事的魔力。温特森承认自己对探索和解放小说的空间和语言更感兴趣。在她看来，以英美为代表的传统西方文化中，小说只是负责讲故事。而在当代，电影、电视载体在叙事上已经做到很好，难以超越性；而电视的大行其道又削弱了语言的纯洁性。不过温特森对此信心满满，新媒体、新技术的出现不一定是对小说的威胁，反而可以成为一种替代和机会，小说可以像诗歌一样去探讨人们内心的感受，这就需要保护和加强语言。很长一段时间，温特森将创作重点放在语言上，探讨内向而非外化的东西，希望就小说来思考小说。

其实，对于小说的“破”与“立”，对于文学，温特森的看法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她热爱独立的私人书店，痛恨连锁超市式的图书卖场；她呼吁爱书的人能保住纸质书市场，在生活越来越便利的时候也不抛弃以往的文化；她说自己这代人传承了莎士比亚、简·奥斯汀、弗吉尼亚·伍尔夫等人的文化传统，责任就是“把书带给下一代，由他



《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中文版

布莱特新作奖。这部作品恰恰可以看作她青少年时代的“自传”，虽然叙述者是第一人称“我”，但作者本人却在写作过程中，从旁观者的视角审视了自己曾经“无法处置的境遇”。温特森笃信，生活在复杂社会，要真诚地面对自己，因此她在创作中也逼着自己要真诚，有时甚至超出了令自己舒服的程度。在书中，温特森把自己年少时的生活现实与虚构交织，她直言：“这并非事情的全貌，但故事就是这样讲的，我们依循心愿编造故事。听任宇宙不被详解，这就是解释宇宙的好办法，让一切保持鲜活生猛，而不是封存在时间之中。”

在写出《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之后，温特森又陆续写出了《激情》(The Passion)、《给樱桃以性别》(Sexing the Cherry)、《写在身体上》(Written on the Body)、《艺术与谎言》(Art and Lies)、《宇宙的均衡》(Gut Symmetries)、《苹果笔记本》(The Powerbook)等重要的作品。2006年，温特森以其杰出的文学成就被授予英帝国勋章。可能与一直以来的经历有关，温特森的生活和写作态度颇有些“自我中心”，她习惯于先料理自己的心情，然后再去管别人的期待，她有5年没有动笔写小说，只写了两本儿童读物，余下的时间就是自己种菜和环游世界。温特森感激现在生活中拥有的一切，希望自己不要裹足不前，但也不会给自己太大压力，“什么时候感觉写不动了，我就会停下来。”



《写在身体上》中文版

《激情》中文版

们做选择，而不是让他们没得可选”，想法颇具使命感也不乏无奈。她眼中的小说有着类似的装帧，但包装下面的核心却充满不确定性。她发现，世界上人们的思想和趣味越来越相似，而小说的功能就是给这一切打上一个问号，它揭示人们心中很隐秘的部分，并向人们发问：你真的想这样选择吗？“小说的作用就是打破固有思想的不稳定力量。”因此，温特森说：“我们不为市场创作，也不为跨国公司工作，创作也不是生产产品。我们创作的是不能以GDP衡量的东西——我们真实的生活。”虽然这番话看起来“阳春白雪”，但温特森很理解如今很多年轻作家的困境：他们的生存压力很大，为了成功，不得不将写作市场化，但他们写出来的作品并非是他们想写的那样。这也说明社会对于作家的不信任，“要是足够信任作家，就要给他们机会去失败”。

### “希望我们都曾改变世界”

温特森从来不希望自己是自我重复型的作



《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英文版

《激情》英文版

《写在身体上》英文版

《苹果笔记本》英文版

## 瞭望台

# 人生就是一朵雏菊

□来颖燕



吉芭芭娜娜

这是一本读起来哀伤却温暖的小书。《雏菊人生》讲述了一个以花为名的女孩子雏菊比梦境更感伤的人生故事——雏菊生来就没有父亲，幼时又遭逢母亲车祸离世，她之所以能够继续活着，是因为拥有挚友达丽亚。与雏菊有着同样孤独感的达丽亚，和年幼时雏菊成为好朋友，从此彼此守护，长大后虽然远隔天涯，却仍彼此感应。生活也好，人生也罢，在雏菊的梦境深处，达丽亚的气息和身影从未离开，甚至对于现实世界中久未联络的达丽亚的死，雏菊也有着强烈的意念感知。

两个女孩子的奇迹感应，让人想起两生花。雏菊和达丽亚，人如其名。一人如盈盈在手的星星点点的小花，平凡但温柔；另一人却如花色浓烈的大丽花，热情又充满怪异的生命体验。但就是这两个性格各异的女孩子，在内心深处有着最不为人知的默契。即使之后天各一方，即使害怕寂寞的雏菊身边始终有亲友的围绕，她们几近奇幻的惺惺相惜，也永远无人可以代替。

生命有时候就是这么不可言说，如果用心，你会发现遍布着不足为外人道的东西，而整个世界或许只有一个人能懂你，更甚或，这个人并不需要在现实中存在。人的灵魂深处也许有着一个奇怪但永久的寄托，因为这个寄

托的存在，现实世界的际遇不论多么不堪，都是可以继续活下去的，因为你始终相信有人会跟你分享这一切的悲喜情愁。雏菊和达丽亚就是两个在充满悲伤和温暖的世界里互相依存的个体，更或者达丽亚就是雏菊的另一个版本，从幼年起就长在了雏菊的心里，成为了她幻觉意念的一部分。

于是我觉得雏菊似乎是个始终无法将梦境与现实区分开来的人，但她的梦境也让我们领悟了人生——也许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特殊，即使痛失双亲的遭遇，在某个角落的某个人一定也能感同身受。想到这些，再多的遭遇，快乐的、痛苦的，又有什么值得跌宕起伏地去看待的呢？重要的在于，你自己是否真正地享受过人生，珍惜地度过生命给予的每段时光。

雏菊的人生就是如此。虽然现实对她而言是残酷的，但是她并没有把自己与别人区分开来，觉得自己的遭遇不幸。相反，她从容地去体验生命给予她的每一次经历，无论是喜悦的，还是悲伤的，甚至是痛苦的，对于她而言，这都是一种必须直面和淡然接受的人生轨迹。就如书里写的：“窗子外面的时间在流逝，而窗子里面的时间仿佛停滞了一样。回顾自己走过的路，虽然坎坎坷坷，但最终总会有一种峰回路转、‘车到山前必有路’的感觉。有一些东西，该留下的却消失了。就像窗外的那片树林，本来应该一成不变地存在，而今却无影无踪。而诸如我的玩具箱、旧杂志之类本该丢弃的东西，却完好无缺地存留了下来，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人生或许就是一朵雏菊，平淡无奇，但是需要足够的真诚去面对。不用引人注目，不用浓烈绚烂，因为对于雏菊而言，绽放过，哪怕只是为自己，就已足够。

《雏菊人生》的作者、日本作家吉芭芭娜娜的作品总是充满着悲伤，但同时又有一股奇异的力量。她被称为是现代文坛“疗伤系”的代表

作家。只是她疗伤的方式如此温柔而奇幻，却又无孔不入，沁入心间，有着日本特有的气息。想起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的话：“日本的文化，从艺术形式来看，一方面是坚强、剧烈、复杂，另一方面是柔和、开朗、单纯。并且，柔和而简洁的艺术形式成了外表，而坚强则包含在内里。”这正如芭娜娜的小说，常常以最悲惨绝望的境遇开头，却用最宽广的大海收尾，读起来温柔纤细，内里却充满着生命的执著和力量。

雏菊的人生告诉我们，每个真心对待生命的人都是一朵雏菊。茫茫人世，虽只是蜉蝣，但在生的旅途上，却一直努力着，尽管现实冷酷，尽管结局无非是死，但这样的生命是何等的可敬可爱。



## 动态

# 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第九届学术研讨会召开

本报讯 近日，以“美国传记文学与传记批评”为主题的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第九届学术研讨会在吉林大学召开。该研讨会由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主办，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承办。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高校的美国文学学者围绕传记文学研究和叙事、空间、身份研究，性别研究，少数族裔文学、生态批评研究等分论题做了文本细读和理论阐释。

传记文学研究成为此次研讨会讨论的重点。“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自传的时代，对这种写作形式的重视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兴趣整体转向自我界定。”针对美国文化研究者的这种判断，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杨仁敬认为，美国前300年的历史都可以说是构建自我身份的历史，是自传造就了美国。《富兰克林自传》更是引发了美国的自传热潮，但同时也引发争议，即“自传是否是文学作品”。杨仁敬认为，在文学创作方面，人们逐渐认识到现代主义创作的局限性，而自传写作则给予作者更多的文学自由。传记文学在未来将会出现新的热潮，其表现就是“疯狂的回忆录”，作品从整体上更加关心个人的内心变化，更关注自我。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逢振就传记文学研究提出了几个问题供大家思考：一是传记文学的概念界定问题，传记与小说能否归于同一个文类，自传和自传体小说有何区别。二是如何认识传记文学的真实性和虚构性，传记的选材由哪些因素决定，是否受社会文化制约，如果是，那么传记文学是否带有意识形态特征。王逢振还对人们只关心精英传记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作为人文学科工作者，应该更关注平民和平民口头流传的传记。

对于传记和小说是否是同一文类的问题，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郭英剑提出了“传记的小说化写作”这一说法。他认为，传记的时间、地点、历史人物等，是绝对不能虚构的，但传主的心里以及无法证实的过程，或者对于某些缺乏历史资料支撑但又无法绕开的历史事件的厘清和推测，是可以想象甚至可以虚构的。而像写故事一样写作传记的“小说化写法”，实际上也在模糊着人们对“虚构类”作品与“非虚构类”作品之间的认识和理解。

学者们还从不同视角对具体的传记文本展开解读。美国2006年普利策传记文学奖获奖作品《奥本海默传》围绕美国物理学家、“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1954年的公审案，叙述了奥本海默一生的经历。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唐旭敏就从互文、叙事、心理阐释和小说表现三个方面探讨了《奥本海默传》的叙事艺术。传记中的互文叙事是指传记利用其他人物（或正面、或对立）展现传主，如《奥本海默传》中，奥本海默的妻子被作者用来证明奥本海默的爱国情结。同时，作者运用心理阐释解答了奥本海默为什么主动研制第一颗原子弹，却拒绝继续研制氢弹等原因。而该传记所体现的小说表现艺术则是通过对话、描写等艺术手法塑造了奥本海默天才、爱国、自负但有时可悲的形象。河南大学教授关合凤则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细读了2008年普利策传记文学奖获奖作品《伊甸园的驱逐者：路易莎·梅·阿尔科特和她父亲的故事》。关合凤通过细读发现，该传记作品表面看是写女作家阿尔科特，但其叙述视角却是男性的。她分析了作品展示出的阿尔科特积极的人格特质，阐明这位以《小妇人》著称于

世的女性如何在痛苦的现实中主动选择去面对，最终收获成功的喜悦。同时，关合凤还探究了传记作者约翰·马特森如何在尊重人物性格和经历的基础上，运用文学写人叙事的方法，达到人物的历史真实性和表现的艺术性之间的统一。

华裔美国作家的传记写作和文本阅读也引起学者的关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美国华裔文学界曾有过一场激烈论争。以赵健秀为主的阵营对汤亭亭、谭恩美等人的创作大加挞伐，认为她们的自传写作是遵循西方自传写作传统的同化写作。对此，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教授石平萍选取了双方阵营的代表性观点进行了深入分析，重新认识了美国华裔自传之争的实质。

(王 杨)



世界文坛

SHIJIE WENTAN

世界文坛